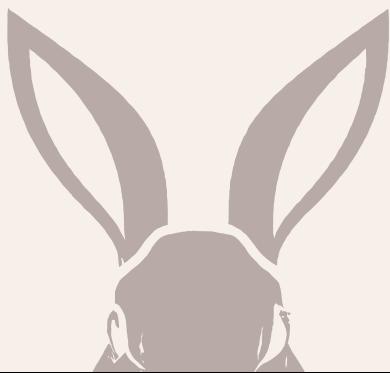


中介 MEDI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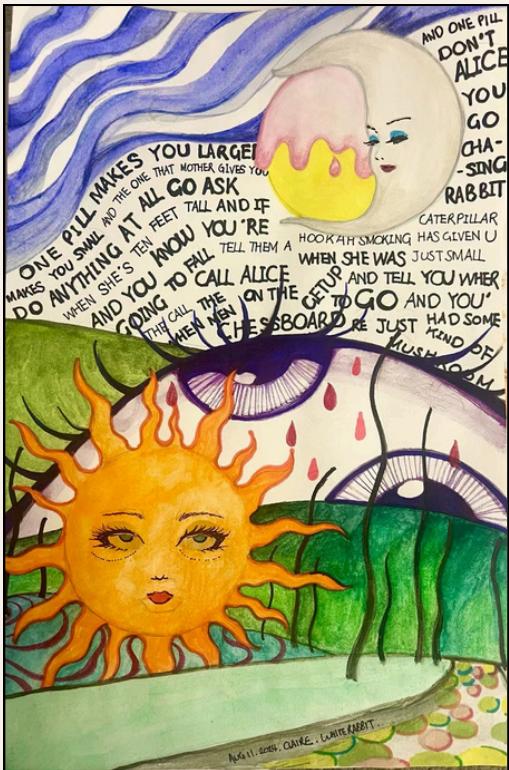
NO.2



九月 2024

# Illustration Art

CLAIRe



I aim to combine visual arts and music, particularly rock, by transforming the feelings and meanings I experience while listening to my favorite songs into paintings. My process involves visualizing the vague images or sensations that arise in my mind as the music plays. I began this journey with "White Rabbit" by Jefferson Airplane. This song, released in the 1967, is closely linked to "Alice in Wonderland," mainly depi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lice when she took the pills/mushrooms and became bigger/smaller. As to me this's a trial to break the rationalism.



# Illustration Art

---

CLAIRe



But why the rabbit? You may wonder about the absence of animals in my initial piece. That's where my second painting comes in, which features a white rabbit as the central figure. Rabbits symbolize speed, impulsiveness, and a certain naiveté, reminiscent of themes also found in Pink Floyd's "Breathe." Here in my second picture, you can see the rabbit being beckoned by a large hand. The identity of this figure is not crucial. I've titled this piece after Pixies' "Here Comes Your Man" in 1989. While the lyrics convey a message of a brave man in love, my focus is on balancing the intense red background with the song's feeling of imbalance and vulnerability to bring out the sense of absurdity. Gonna be more in the future.

Clairrreee. Aug 19, 2024



# Illustration Art

CLAIRe

P.2



## 具體的辯證法 · 二

萬類霜天競自由

P.5



## 香港與世界： 論左翼，自由與實踐

BONE

P.9

## 食譜： 《家常便飯》 · 二

棉籽

P.29



## 常態實用化系統論（一）

愛與和平小天使

P.32



# 具體的辯證法 · 二

## 萬類霜天競自由

### (一) 開端

在這一系列文章寫作計畫的開端，我無法確定這一系列文章將把我們帶向何方。但我要做的是去從事一種科學，讓事情帶領我們前進，儘管我們在最開始會陷於錯誤和不完善的表達，但這些缺陷會在事情的進展中得以克服，但這樣進步的科學計畫能夠達成事實上依賴於作者的退讓，他不能在「詞句選擇」上反復猶豫以致於最初突破性的要點被正確性的考慮所消滅了——進步的科學計畫有賴於機敏性，關鍵不是在一開始去構建一套自圓其說的體系，而是去勾勒關鍵問題並儘量簡潔地表述出來。我們姑且稱其為理性的解放，但計畫的真正困難之處是將突破重新組織為一系列概念體系以達到具體。



這一系列文章的緣起是一場失敗，我們姑且稱之為網哲區的失敗。2021年以來，在中國互聯網上，有一系列普及和討論哲學的群體逐漸形成可觀的規模，他們在一個短暫時期內顯現出難能可貴的朝氣並決心在現實中從事些什麼去。他們最開始的討論和實踐熱情可能主要是借助於偶像崇拜一類的並不十分嚴肅清晰的動機與願望，但這樣的動機與願望既是路標又是鬼火：在不走教條主義，放棄歷史包袱，破除圈層固化保守化的時候是路標；在長期有計劃的發展和團結上卻是鬼火。

這種朝氣已經日漸式微，且最初能夠讓大家忽略諸多齷齪的單純願望也早已不那麼有力量——這是自然的，進步的綱領需要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具體化，這樣他才能有源源不斷地推動力，並在各個方面團結不同的人。顯然，處在這一潮流中的人不會後悔自己進入到了這一潮流之中，因為比起在脅迫下生產垃圾與浪費並佯裝陶醉於升級版的小紅花貼紙的人生，和朋友一起積極地做些喜歡的事情不會更差。但是，如果這浪花逐漸消失，最終，處在潮流中的人各自回到自己的發小紅花貼紙的課堂去搞一小片社會主義，以致於浪花最終成為了青年記憶而不會帶給意識過多不快，只有一些懷舊情緒，那麼，這樣的圖景將不是可接受的。潮流將成為浪花還是海嘯？當最初的單純願望已經無法成為有效的指引的時候該如何從事和發展社會主義？這些問題絕對不可交給記憶和存在的自動性。

在智識上還是在體力上；社會主義許可全體人民對於生產資料的管理，而且這種管理不是虛偽的，不是名義上的，而是實際上的；社會主義不是一個人或一些人的社會主義，而是所有人的社會主義，所有地區的社會主義；最後，我們不會荒謬到為了在麵包上塗奶油而放棄社會主義，不會荒謬到了為了「小紅花」而背棄社會主義。這樣的社會主義，不是靠一群人或少數人的上層設計和籌畫，而是靠每個人的積極性和堅韌的勞動。



上述討論的目的在於為我們的寫作計畫勾勒出一個開端，我想這個開端主要與各種情境下人與人的交往樣式和社會關係及其矛盾有關。如果我們認同未來屬於一種根本不同的社會關係，那麼我們在哪裡能找到這種社會關係的雛型的或普遍或零星的存在？這種社會關係是否需要像資本主義一樣為自己製造其所需要的身體？我們該如何設想這種社會關係的擴散，是一種流行化嗎，或不是？或者說，我們能否想像這種關係像流行文化一樣容易地去傳播？這種社會關係的主要矛盾是什麼，它何以存在於當前的社會中，又為什麼無法成為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關於這一系列問題，我們尚且知之甚少。

## (二) 遊戲

### (1)

我們從遊戲談起。這是出於兩個原因。第一，前文講到一種像流行文化一樣傳播的交往模式，那這種模式在我們這個社會中的典型例子是遊戲，遊戲常常以很大的熱度傳播，凝結一些身邊的人以一種設定的方式交流，當然，有的遊戲是只有一個玩家的單機遊戲，這個主題也會在之後的部分中涵蓋。第二，對於有意識的存在而言，遊戲是基本的功能，它在生命的有意識存在中佔據了相當大的部分，認為遊戲強烈地關聯於哺乳動物的社會關係不是什麼新鮮的觀點。在這一部分，我們主要的目標是去勾勒出遊戲的主要概念並提出問題。



遊戲這一概念的基本矛盾是擬相-真相，任何遊戲的基本元素都是模仿，一旦模仿的成分完全消失了，那麼遊戲的體驗也完全不存在了。任何對遊戲可以不設置/去除任何阻止我們浸入其中的障礙的想像都是徒勞的，因為一旦這種障礙被去除，那遊戲的體驗事實上也消失了。我們不要停留在這一基本問題上，關鍵在於遊戲中的真相是什麼？嚴肅的反思必然阻止我們去設想存在一種「真實的社會關係」，而遊戲是對這種社會關係的模仿。難道遊戲不是人與人之間「真實」地交往嗎。那麼在這裡真相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歷來文學創作和為人津津樂道的傳聞中一個常見的體例是在戲劇中的殺人情節因為疏忽而真的殺死了人呢？可以說，遊戲不是描畫真實的存在，而是對什麼是真從自己這個方面出發來設置條件。遊戲中真實的意味，必然與擬像中不斷的重複，可以跳轉的時間線相對立。

除了擬像這一特徵外，對抗是遊戲的另一個特徵，在遊戲中意識的座標在於膜層之處。在遊戲《恐怖驚魂夜（二）》的一個篇章中，主角一行人面對巨大的、繁殖能力極強的蜘蛛的威脅，而在打敗蜘蛛之後卻發現，蜘蛛其實是鎮壓另一種象徵著永恆的蟲子的衛士，在蜘蛛滅亡之後，象徵著永恆的蟲子有足夠可怕的力量讓人不老不死地限於備受折磨的活地獄之中。於是在篇章結束之際，我們獲得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視角，在我們之前看起來平靜的日常生活，竟然只是永恆的魔鬼和增殖的魔鬼激烈對抗之際的短暫間隙。

既然意識形態的首要功能是經濟結構的再生產，那麼為什麼意識形態總是處在激烈的對抗之中？一方面當然是因為生產意識形態的經濟結構矛盾，但另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存在方式需要這種矛盾，一組意識形態話語被生產就意味著對抗性的意識形態話語被生產，並在這種對抗中發揮作用。

對抗意味著撕開一條道路，而人的生存就意味著建立掩蔽所和外殼，因此在主體性的作用下，大量過剩話語被生產。但意識形態對抗的狡黠在於，過剩話語看起來像是堅固的可靠的庇護所，事實上僅僅是受制於其對抗的意識形態牽制的可憐的木偶。



# 香港與世界： 論左翼，自由與實踐

---

BONE

你們心裏都清楚地很，個中道理與利害關係，你們僅僅是等待著我們為你們說出來，即便你們可能既不情願也不期待，甚至還帶著一種鄙夷，還是說，恐懼。我們既不是耶和華也不是君主陛下，我們所說的話語原本是貧瘠的。可若情願去忍受這種自尋煩惱，或者說有勇氣去直面這種需要忍耐和勞作的道路，那麼也無妨再試一次。



# 引子

當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逐漸從一個具有特殊目標的群衆自發抗議活動，逐漸轉化為一種普遍的，抽象的，否定一切的，強迫性重複的對於固有社會政治秩序的挑戰的時刻，曾經有一篇微信公眾號短文在在港內地學生的群體中得到了廣泛的轉載，這篇文章描繪了這樣一個幻想性的場景：

時值週末，港島的街頭上擠滿了抗議的市民與學生，警隊與催淚彈都已準備就緒，衝突在不停地滋生並爆發，沒有任何要停歇下來的意思。此時，一群對現狀與未來感到困惑的高校學生匯聚在了某位學院精英置於半山的別墅中參與了一場聚會。或許是學生們多多少少流露出了此次事件對於自己生活的可能影響，這位精英最後在大家的擁簇下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這次的動亂歸根結底是由於普通的民衆對於自己生活充滿了不滿和壓抑，政治的口號與訴求無非是一種盲目衝動下所追求的虛假目標，而等到這一狂熱褪去，這些幼稚與謬誤的行為將會被遺忘與糾正，一切又會回歸到風平浪靜的過往，群衆將會重新被迫去面對他們真正的問題，而我們則只需要不忘初心地在這個社會真正的發展道路上就足夠了。聽罷這位精英的見解，在座的年輕人們都大受啓發，心中的不安與恐懼也受到了安撫，一路過來的緊張情緒也就彌散在了由這位教授的成熟思想與卓越社會地位所許諾的未來之中。

這篇文章與其所想要刻畫的場景本身無疑是充滿了保守的精英主義色彩的，而我們目前的所要做的首要工作並不是著重去批判它，這一文章本身已不再產生效用，但悖論的是，這一荒唐的故事卻使得我們從中汲取了一種動能去理解我們當下的困境與真相。

整個故事的謬誤之處在於，精英主義的僕從們自以為相較於「平民」更掌握真理與智慧並妄圖通過這一優勢地位來控制民粹為己所用，可究竟是什麼樣的時代造就了這樣一幫學生，竟然可以在一場聚會中聽到一段「智慧」後便自詡掌握了這個世界運行的真理並洞見了未來的方向，坦然接受資產階級為自己不安的精神做心理按摩，殊不知他們本身卻實實在在地淪為自己眼中所認定的愚昧者與無能者。這一聚會本身並不是什麼政治沙龍，但話題不可避免地被引向了街頭上的事務，這無疑是由於這幫學生對未來在這一城市乃至於整個國家攫取利益的前景感到了不安。這幫學生曾七嘴八舌得討論過一些什麼，即便我們抱著最大的尊重與好奇心去發問都已經無從知曉了，因為歸根結底他們期待的無非是他們主人的答案。

而他們的主人與其說是洞悉了街頭的民衆，不如說他更瞭解眼前這幫年輕人期待著什麼樣的答覆，所以他告訴他的學生們：「你們如今內心所擔憂的所謂政治問題對你們生命的衝擊不過是一個幌子罷了，你們最為關心的無非是你們最為貼身的利益，所以啊，追隨我的道路，接受我的指引，利己主義萬歲，資產階級的統治萬歲，資本主義萬歲萬歲萬歲……」。



# 1. 忠誠的負擔

香港的政治問題是一個令所有真誠的左派都忍不住頭疼的問題，我們被嵌在了一種理論和實踐的雙重無能之中。在理論上，我們近乎於無法在香港群眾當中，在他們的政治訴求當中作出一種有效區分，來評判說誰代表了受到壓迫的無產階級，誰代表了反動的統治階級，什麼樣的行動是符合了無產階級的長遠利益的，什麼樣的行動是妨害無產階級的利益的。這種理論上的迷茫在很大程度上來可以被稱作是一種創傷性後遺症，這一創傷性經歷歸根結底就是各流社會活動家與組織在他們政治實踐中所遭受的一種未被公開承認的巨大失敗，以及其未被承認性與未被總結性本身。

2019年的修例風波是香港社會矛盾的集中體現和一次絕對的爆發，而這一事件的絕對性在很大程度上與上面這一則故事中所暗示的那種盲目衝動與幼稚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當時街頭的示威者當中充斥了數以十萬記的，在幾周前尚且「政治冷感」且毫無社會活動經驗的群衆與學生，這絕非偶然，也不是以單純的境外敵對勢力煽動所能完全解釋的。他們的行為，在今日看來愈是無意義，愈是非理性，則愈發表明彼時他們在客觀社會情境中所遭受的壓抑不可陳述性與不可調和性，即一種社會結構關係的剩餘。絕大多數在這一事件中親身經歷而又倖存下來的個體，不可避免地，亦都是不幸地，令人痛心疾首地，繼承了這樣一種「失語」的特質，矛盾的不可描述性變成了失敗的不可描述性，矛盾的不可調和性則轉變成為了行動的不可調和性（缺一個數字便不行，而「一」即全，即整體，）。



因此我們有責任提出這樣的一項基本的任務，我們要承認事件之所以為事件，意味著一種絕對的斷裂。而這恰恰是香港的主流市民社會輿論空間中所普遍排斥的，它依然固步自封在原本的自我想像與認同之中，因而它也就僅僅作為一個衰敗的市民社會而延續著。無論我們在主觀上如何抵賴，但那些作為社運象徵的紀念活動在很大程度上的確已然與「貞操帶」（倒是施永青作為一個最終拋棄了左翼理念的資產階級成員能毒辣地說出這樣一個暗喻）無甚差異。它緬懷於過去的輝煌並以這種懷舊來消遣當下的屈辱，並幻想著一種自身絲毫無法棲身其中的來自未來的償還。因而它也就放棄了在孕育一種個能夠在未來的衝突與矛盾中具備更強行動力與自主性的革命性力量的機會。左翼要做的正是要接過這一任務，在各種意識形態和利益團體重新結構起社會場域的過程中尋找自己所可以撬動的板塊與彙聚的力量。

因此在此處至關重要的是，承認失敗首先並不意味著以一種拜物教與戀物癖式的方式來沉迷於失敗。失敗在未來的道路中不應該是一種來自過去的痛苦經歷的回響，它不再是催淚瓦斯在鼻腔中的震蕩，不再是一紙法院傳單，也不再是舞臺落幕後的落寞與抑鬱。失敗應當呈現為一種反射性的機械性的「不」，一種拒絕過去的幽靈重新降臨的抵抗，它如利劍斬斷因果之鏈的所謂主導性力量：「是，我明白你說的這一切，過往是屈辱的也是無法令人釋懷的，正因如此，不，但是，我不會讓相同的結果再發生第二次」。我們要做的是盡可能促進這種從「正因如此」向「但是」的轉化，在最低程度上亦要為「但是」正名，使得其得以在公眾領域中被言說。

這種否定性立場代表著一種清空性的力量，當教訓得以被總結之後我們將會急切地需要要卸去來自過去的包袱，輕裝上陣，以便擔負起將鬥爭的中心重新匯聚於此刻此地的責任。

「但是」能夠指向一種毫無由來的發聲點位，一種毫無緣由的主張，因此言說者得以暗示他將會是自己的主人，因為它表現得不願為人所馴服，從而來卸載他所惹來的各方猜忌認為他話「後」有話。他要求將高階次的政治活動重新坍平，得以讓尚未具有豐厚社會經歷的年輕人能夠以一種百花齊放的方式參與到庶民政治活動當中，而非從最開始便被迫成為某一方的擁躉並遵從那些仍未與自己生命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遊戲規則。



在此必須牢記的是，忠誠有些時候恰恰需要一種絕對的背離，而絕對之所以為絕對是因為它恰恰矛盾地差異於它字面上的含義。將一件事物供奉在神龕廟堂之上往往已然是處於對那一事物所牽引的矛盾鬥爭的妥協，而對其崇拜與唯馬首是瞻則已然將自身的支持降格為無恥的背叛，正如民衆也常常認為孫悟空這一名號中存在著更多美好的理念，而不是在鬥戰勝佛這一名號中。對於這一問題，在我之前對於信仰，忠誠，神秘，與背叛之間的辯證關係的短文中已經有過論述，在此節選一段：

信仰，忠誠，神秘，背叛之間存在著吊詭的辯證關係。一種對於歷史終點的盲目信仰，即幻想著在遙遠的未來具有一個客觀整全的評價體系予以人類生存之整體意義以評價，那麼這只會成為懷疑和動搖的土壤。一個人會因此在各個階段中放棄當下自己與周圍人的關係中所產生的“片面性”，進而把這些事物的評判放在遙遠的未來，當下對於他而言就失去了絕對性。未來，正如同他的當下，變得是神秘的，不可測的，與主觀意志分離的：即便他們宣稱未來是確定的，無論是所謂的民主社會抑或是共產主義社會，他們依然陷入到了史達林主義的悖論之中，因為作為主體他們不能知曉在哪個階段他們就被認定為了革命的叛徒。人因而也就無法對於當下的事物，人際之間的關係與組織保持忠誠，他保持的信仰僅僅是一個遙遠的抽象的歷史重點，這樣一種神秘化的信仰只能導致背叛。忠誠所要求的恰恰是打破這樣一種對於未來之純潔與整全的一廂情願。忠誠在於一個人在當下見到了他所期待的歷史的醜陋和自相矛盾的那一面之後，依然拒絕去否認這是他期盼與參與的歷史，在於他拒絕將自己的經歷與生命從通往歷史終點的精神與鬥爭運動之中分離出來。



# 自由的二律背反

在此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與我們最初在反修例的風暴中所瞥見的事物具有一種結構性的相似，儘管多少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與我們最終的結論相悖，但在邏輯上卻具有一種必要闡明的聯繫。我們需要把注意力重新放在反修例運動當中那個如鬼魅一般的，揮之不去的瘋狂之中——必須強調的是，我們之所以得以在此討論這樣一種瘋狂恰恰代表著我們已經離開了彼時的那種瘋狂。

自由的源頭便是一種瘋狂，而這種瘋狂來是一種至高意志的自我矛盾與悖謬，這一點在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的風暴逐步席捲歐陸的時刻便已然被我們所洞見：對於神來說，它是自由的，它可以作出任何的行動，但任何的行動及其結果都能反過來規定與束縛住神本身（顯然，「神」本身較「創造了世界的神」更為絕對也更為自由），神因而陷入到了對於設定性的否定當中，這個否定最終是一種普遍性的對於自由的不斷的否定，而對於自由的否定最終轉變為了否定性的自由，一種執著於將任何對於自由的具體規定給清空的對於「無」的欲望最終轉變成了對於「無」本身的欲望，“I want nothing”轉變成了“I want nothing”。



基於這樣一種對於自由的洞見，我們必須做出多重的鬥爭，即使這種鬥爭會讓我們所期盼的力量處於一種看似邊緣化的境地，但是這種鬥爭在長遠看來將會是值得，因為我們相信這樣一種鬥爭是在整個社會治理與衝突的範疇當中產生出來的，是一種不得已的鬥爭。

## 無產階級何在？

首先，存在著一種幼稚的，過於急切的，或者是不誠實的左派話語，這種話語刻意以反修例風波中與消費主義，享樂主義與全球主義有機結合的小市民意識形態來以偏概全，從而認定整個反修例風波所折射出的一種自由觀是純粹僕從于全球資本主義的，這表現為對於雜多而並列的政治立場與政治選項的物神化的崇拜，而正是這樣一種崇拜愈發穩固了高階次的全球資本主義霸權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統治地位，它使得人民忘卻了真正的敵人，轉而為它而效力，並削弱了那些一直以來與這種霸權作鬥爭的政治集團的力量。我們必須要非常誠實地反駁這樣一種話語！就客觀結果而言這幾乎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可以斷言說風波結束後的一系列社會管制的緊縮，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補救、預防與整改的措施恰恰證明瞭這一點。當局與香港社會運動團體都因他們無力用更好的方式化解這一項危機而在這場風波之後受到了重創，前者被迫使用低階次的政治意識形態鼓動機器來直接施加影響，愈發加重了群衆的反感抑或是冷感；後者若不是在組織上受到限制便是在這場風波後逐漸失去了發聲的空間與立場遭遇了普遍的「失語」。正如我們發自內心認可馬列毛主義者們在這一立場上的真知灼見一樣，我們必須對這一個具體的錯誤判斷提出批評：原教旨馬列毛主義者們所假設的一個強有力地與親自由主義的市民階級就社會改革的方向進行鬥爭的成熟左翼團體在當今並不存在！因而當無產階級在一場新的社會運動當中被號召起來抑或是產生出來的時候，它不可避免地會與自由主義話語所裹挾並趨向於合流。

我們必須留意到，在這種風波當中激進化的群體並不都是經典意義上的小市民，他們更多是的是年輕的沒有過多社會閱歷的青年人甚至是脫產學生，他們絕大部分出生於普通的工薪家庭，而他們未來的生計亦明確依賴於自身的勞動，因而他們自然而然地在無意識中就接受了許多由舊有的社會結構強加在他們父母輩身上的壓抑，因為這些壓抑又由父母們無意識地施加到了他們的身上，因而他們便有理由就許多一般性的困境感到憂慮：社會流動與上升管道的鎖閉，高企的地租與房價對於他們發展幻想的蠶食，社會整體的精英主義氛圍與原子化的生活方式大行其道但又無法被新的秩序所取代，貧乏且具備奴役性質的社會福利制度更是在事實層面上是承認了階級固化的正當性與必然性——這都過早地激化了香港青年對於實現他們自身的家庭與階級再生產的無能幻想，因而必然導致他們自我意識再生產的危機化。青年們早熟地領會到了自身低人一等的滋味，在他們意識到這是一種普遍的境遇之前他們的自尊心依然受創並已經做出了防禦性的侵凌姿態，他們距離通過自身去創造一種具備尊嚴與力量的集體還很遙遠（這樣一種集體要求他們批判性地在現實中進行鬥爭才能夠形成，而在他們當時的世界中種種條件依然缺乏），因而他們會急切地去尋找一個能夠以積極性的方式填補這些匱乏的救命丸，一個具有清空性力量的符號是他們所迫切需要的，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對於看似具有「顛覆力量」的集體行為將會毫不猶豫地服從，現在點燃他們就僅僅只需要一個引信。



那些老練的激進分子在反修例中利用了「引渡」與「送中」二詞所帶有的一種暗示，來呈現出一種強力性質的，從一種狀態向另一種狀態的扭變，毫不意外，在危機下癔症化的主體恰恰就是就是對於自己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據的點位不停予以否定而又焦慮地等待一個設定性答案降臨的。自由主義的話語已經為他們提供了那個否定性的選項，因而癔症的主體所作的便僅僅是承接那個肯定性的身份：「我的生活不是按部就班的，我的未來沒辦法按照所有人所暗示的那樣去過活，我歸根結底不是精英，自然而然如你們所說，我也不該被引渡成為另一種法律主體，所以我所能確定的便僅僅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香港人！」。一種短路由此被誘導，一種更傾向於自我保護的認同被迅速裹挾成了一種政治上的分裂主義，

這當中一方面當然是利用了青年群體的衝動與不成熟，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由於自1990年代以來的香港社會運動整體形態所形成的話語體系，它們以一種共時性的原則迅速啟動了兩地幾十年以來累積的所有在社會話語場內被挑明瞭的矛盾。即便當時“HK is not China”這一句的原處含義是指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司法體系相互獨立並被用來抗議引渡條例的提案，但是時至今日沒有人會真的相信這是這句話的全部意涵：二者之間的差異是被一種鄙視性的，侵凌性的方式被表達出來的，它歸根結底是一種分離主義政治訴求的被壓抑式的表達（由於香港的從屬問題是被禁止爭辯的被壓抑的，因而這一口號最後只能以「是否等同」的邏輯關係來表述而不是「從屬」的邏輯）。

在理清這一系列的事實後，我們應當看清這場風波從本質上根本不是有關於立法或是司法制度的抗議，它也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小資產階級街頭運動。我們看到的是廣大工人階級的子弟同樣在社會整體矛盾中激進化，並且幾乎是毫無選擇地允許了自由主義，民粹主義，以及本土主義對於他們的徵召與動員。就結果而言，香港的左翼在過去的三十個年頭裏並沒有成功地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一種去改進自己生活方式從而謀求變革的倡議，更沒有用一種可行的樂觀的鬥爭精神去感染和鼓舞他們，因而真誠的左翼分子從最開始就應該對於這一事件的走向與災難性後果負起部分的責任並進行嚴肅的反思，如今最為切實的做法便是不再滿足於過去在主流媒體中那種刻板單一的叛逆形象，不再武斷地將責任推卸給群衆的所謂小資產階級特性，不再在政治投機的活動中喪失自身的立場與力量。

我們應該在什麼樣的意義上保留左翼青年運動的優良傳統？我們難以想像喊口號，大字報文宣，原教旨主義的煽動這些傳統的方式仍能夠在當今的香港奏效，這些行動也完全無法代表左翼政治行動，這種嘗試用狹義上的左翼文化來直接號召對於社會主義的熱情的行為是不著邊際的。但是同樣真實的是在今時今日，這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何嘗不是同樣成立的？我們不應該被現（舊）有市民社會仍然殘留的拒絕反思的主流意識形態遮蔽我們對於新生事物的判斷，我們應該同樣意識到他們主導性力量必然地被削弱，這不光是強硬的國家政策的外部幹預所導致的：他們的團體內部亦會產生差異從而嘗試與更廣泛土壤中的那些新生的否定性力量重新結合，這當中會具有欺騙性的投機性的人，也會有更為真誠的在挫折中吸取教訓的人。

那些新生的否定性即便能夠暫時被所挾持或是利用（沒有人可以否認這一點，不妨去聽聽那些感到被深深背叛與欺騙的青年人的立場），但是歸根結底後者產生於一種不同的時代背景與土壤，沒有人可以要求他們去背負過去的某些特定立場，因為他們是新生的力量，他們歸根結底要尋求一條不一樣的道路，來獲得屬於他們的活動與組織空間。



可笑的是，這恐怕自由主義與其他形式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會強烈反對的，這也就深深揭穿了他們的自我矛盾與欺騙，因而歸根結底他們不認同這樣一種不一樣的道路，因為他們反對一切形式上的對於他們路線與道路的否定，這種最為堅定的否定也就來自於一種新的實踐。他們對於路線差異的認可僅僅限於以下絕對前提：這些差異產生衍生自同一個理念，這一種可被闡明的理念必須為所有入所認可且其根源為他們所共同繼承（本土身份認同，對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狂熱，對於市民社會的特定幻想等等），一種樹狀的結構，這種結構最終體現在了那句著名，抑或是在我們現在看來臭名昭著的口號中：「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在一場所謂「去中心化」的運動中，自由與民主僅僅體現在個人的好惡當中，個體成為了絕對的中心化核心，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聯繫不是通過具體的組織活動與綱領進行中介的，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聯繩不是通過具體的組織活動與綱領進行中介的，並且挪用了地域，宗族血緣等前現代權力機制來進行鬆散的組織，

然而在本質上是自我中心的政治行動。對於他們來說，自由與民主就是一個由他們所抽象地，妄然地，直接地代表的社會整體理念，他們所追求的歸根結底是一種民主主義專政。而不是體現在所有的生產，組織與行動的實踐中的具體的精神，原則與紀律。對於那些象徵性事件他們會用絕對專斷且接近於恐怖的標準來要求所有社會成員的認可，抑或是說在他們眼裏不認可者就是不可交流的抑或是非人的。而對於現實中的不一樣的創造，他們懷有一種根本的敵意。因而在由這樣的個體與利益集團所把控的社會團體或是組織中我們不難看到他們的自相矛盾，獨裁，個人（實質性與象徵性的）崇拜，人身依附，利用並透支青年的政治生命，拉幫結派，小圈子決議與自我封閉，利用政治資本打壓後發個體等等這些事實上有悖於民主實踐的東西在他們本身的組織中恰恰是最為常見的。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具有激進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往往更加樂意半吊子地混在學院當中觀察動向而不是直接加入到社會團體中，因為這些團體在事實上很少通過民主的原則來組織群衆運動並具有一種天然的排外性。

左翼行動者或者團體應該避免這些錯誤，這就意味著需要在意識形態上更為包容並且變得善於轉化不同的矛盾。根據之前的分析，依據抽象的理念而進行一刀切的批判或是否定往往是一種錯誤，如何在組織的形式上設法盡可能團結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我們要停止幻想用一種總體主義化的方式去要求每成員的根本認同，我們從歐洲民主國家的法西斯化的過程中難道沒有吸取任何教訓嗎？我們要做的是通過團體的民主決策與互相之間的督促來形成一股新生的社會力量，而這所需要的正是每個人的生命本身，而不是抽象的理念等級制與意識形態對壘。在這個過程不僅包含著吸納成員的考量，也有著尊重彼此獨立性基礎上的合作與團結。在這一基礎上，保持那些優良的左翼傳統，也就是堅持對於底層群衆的團結與組織活動，從那些力所能及的，能夠腳踏實地的，群衆們最為關切的，且對於未來鬥爭走向起到至關重要影響的問題著手：這當中包括了工人階級所面對的常態化問題，如工人本身的健康保健，勞資糾紛，工人子女的受教育與在社會化過程中遭遇危機的各類群體，並以此為基礎來尋找一種可複製的政治組織模式。

# 政治的世界

至此，我們已經對於上述的「左派」幼稚觀點完成了基本的反駁，值得強調的是，這種觀點即便更多的是來自於外在於香港社會的，它們也非常微妙地構成了部分香港工人群衆對於左翼意識形態的誤解並且陰差陽錯地產生了一種不解與反感，這對於我們未來的工作將會是非常不利的，因而在此我們有必要在理論與事實上進行必要的爭辯以避免這種左翼觀點在現實中淪為一種教條主義。



而在澄清這一些可能的誤解之後，我們現在必須要簡明且嚴厲地向一類更為反動的，甚至是放棄了20世紀以來所有的左翼運動，民族解放運動與國際主義運動之政治遺產與鬥爭原則的立場劃清界限，持有這些立場的人在過去的30年裏面已經在整個社會中描繪了足夠多的足跡了：他們從相對溫和的，尋求自我歸屬感的，具有本土主義傾向的失意知識分子群體中尋求支撐，無論他們的思想背後的形象是穆勒還是羅爾斯還是馬克思還是托洛茨基還是那些不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僅僅因為他們選擇埋葬了自己的姓名），他們大多在社會矛盾展現的過程中被轉化成了實實在在的自由主義者，這種自由主義從香港穩固的法權與龐大（相對其人口總量）的市民階級建制中抽象出了一種獨屬於香港集體的精神與文化實體，這種構想在社會「底層」亦具有民粹化的可能性。

即便「香港民族」這一概念是被絕對壓抑的，但是從香港的民粹-自由主義者口中對於「殘體字」「普通話」以及針對其他中華地區的文化特徵的鄙夷中我們不難得知，這是一種處於激進化進程中的思潮，它們邏輯背後的真正終點即分裂主義，即對於世界最大的，對於歐美帝國主義國家而言最具差異性，獨立性，抵抗性的政治集團的肢解，而由於這樣一種引導政治變革的道路與思想不受中華地區無產階級的共鳴，且為政權本身的邏輯所極度排斥，因而它註定是一種無法與中國及其無產階級發展進程有機結合的思想。因而這種立場被再三強調與提出並不是出於一種政治目的或是作為一種解放性的運動，而是一種對於本國政權的直接仇視與敵對行為。

我們生活在一個政治的世界中，即一個具有後果與影響的世界當中，意圖 (intention) 本身並不能構成我們的整個世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背負了昨日的哀傷和屈辱，而它們又不會直接轉化為新的意圖或是精神，而僅僅是作為一個疤痕存在著，人就是這樣一種疤痕。人的存在形式決定了他們不得不去彌補創口來生存下來，但是這種彌補永遠不可能將機體修復到最初的完滿狀態，增生的疤痕作為一種冗餘存在著，意味著後果與意圖之間無法跨越的差異，意味著意識被迫擔當起一種責任去仲介這樣的衝突，因而也就不存在著這樣一種擔保去保證一種「本真的無害的普遍的」意圖不會帶來一種災難性的後果。正如那句著名的詩句中所寫的那樣，我們或許會被迫用一把好槍，挑個好地方，用一把好鏟來埋葬一個「好人」。

我們從歷史中學習，因而我們具備了這樣一種能力，去從敘事結構中設想和把握不同意圖以及他們的後果，歷史之所以是可理解的甚至是可預測的，恰恰是因為歷史的結構與我們所把握的符號秩序結構是非常親近的，我們總是在我們自身的意識中發現那些已然在歷史中呈現的矛盾，我們對於歷史的洞悉則得益於我們自身意識在意圖與後果之間的徘徊與掙紮，而正是在這種往返的被逼無奈之中個人與歷史被愈發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正如許多國際上的左翼活動家，尤其是在國際主義運動當中所經歷了慘痛的失敗並償付了巨大代價的民族國家的左翼活動家們所認同的那樣：「當今對於中國的肢解將會是人類文明中最為慘痛的倒退。」



因為對於人類文明在20世紀所得悲劇性災難中所達成的共識在不斷地受到威脅與摧毀：南斯拉夫的災難性解體留下了一個孱弱而分裂的巴爾幹，不同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之間的仇恨與敵意隨著他們族群自我認同的加強而不斷加劇，即便兩個民族群衆之間的文化與語言的差異小到能令任何一個共和國政權都樂意將他們聯合為一個家庭，即便他們的差異僅僅是在南斯拉夫的現代化政權下因政治上的平衡考量而被刻意製造，而作為追求獨立自主的結果，如今七個民族政治團體的總和體量甚至比不上他們西歐鄰居的一個省份，這片土地也成為長期動亂、仇殺與貧困的源泉。除此之外呢，俄烏兩個在沙俄統治下具有數世紀共融，並擁有近一個世紀的現代政治聯盟歷史的民族政權如今竟互相仇殺；

以色列以應許之地為名的對於巴勒斯坦的無止盡傾軋屠殺；菲律賓民族上億人口處於半殖民半封建的秩序下，人地皆失，淪為本國買辦資產階級的所有物……我們該如何盡書這種人類政治模式的倒退？我們並不是生活在一個進步主義者們所設想的世界中，許多對於我們至關重要的政治遺產，革命的果實與軀殼，時時刻刻受到著威脅，並取決於矛盾的開展與階級力量對比的扭轉。過去的歷史已經告訴我們，無論一個地域性政權其本身是否具有它所處時代的先進性，在其平民政治的土壤中，左翼的力量始終應當「掌握掌握者」，用盡一切努力，在特定於他們的時代與社會土壤當中去聯合，甚至是創造無產階級。任何對於這一歷史使命與責任的遺忘或是忽視都意味著左翼放棄了他們改造世界的初衷並淪為了憤世嫉俗者抑或是空想家。

# 我們

那麼回到我們最初的问题當中，我們應該如何去尋找與創造這樣一種萬眾期待但同時又令人騎虎難下的，對於我們具有積極意義的認同？答案是堅持一種消極的認同，比那些自由主義者們堅持地徹底地多。讓我們來重新描述一次，這種新的認同應當是以一種歇斯底作為開端的，也就是說在面向整個意義體系來確證自我身份時，她獲得的僅僅是否定：我到底是什麼呢？

我不是這個，也不是這個。那麼我到底是什麼呢？這種邏輯並不等同於在流俗意義上的酷兒精神，即非所謂的追求不被定義，而是一種動搖定義框架本身的重複性的行為，這意味這一種非人格化，一種對於戀詞癖與拜物教的剋服，若說我們還有一種秉性的話，那麼這種秉性來自於一種否定之否定，它拒絕被廉價地批量化地收編為相對主義世界觀中的一個元素，哪有什麼神仙主宰，更何況媒體之喉舌，文人之辭藻，即便當有人以「抗爭」一詞來描述我們的秉性，我們也應當向世人證明真正的抗爭恰恰是敢於對抗爭性本身進行抗爭。因為我們深諳如下的真理，「抗爭」可以是革命式的，也可以是僅僅供人所消遣的，也可以僅僅是一種甘于統治的手段，因此我們不會愚蠢到去膜拜這樣一種狂妄的對我們的本質的規定，我們之所是是先於這種規定，且我們鄙視那個沉迷於反抗當中自戀形象。



我們本身並不直接是任何具體事物，我們之所是依賴於我們在整個歷史進程中對於其他政治群體的意義，對於他人的生活及其組織模式的意義。從自身所處的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環境出發，去思考如何會有切實可行的方案去參與到後發民族，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與解放的事業當中，從而扭轉無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統治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正如我們不可能直接成為代表他人的領袖一樣，我們也不可能直接地成為自己，我們只有通過對於他人的幫助，協商與合作才能意識到自己是什麼以及成為自己所是的人，也只有從當中的挫折，失敗與痛苦中才能真正作為這個世界中稚嫩的脆弱的但同時又富有朝氣的力量成長起來。

我們明白那些冠冕堂皇的大詞，不管是自由，民主還是獅子山精神，無不是浸潤在了舊有的社會關係以及遺留的政治矛盾延續當中的，將自身掩藏在全球主義與普世主義背後的民粹主義者們與自由主義者們不願意承認的是，就在於而他們所幻想的一種本土內核精神或是價值是充斥著香港的父權-資本主義社會所結構出來的各種語言，文化與政治思想慣習的。即便在前文中我們斥責了一種左翼同僚們難免會犯的錯誤，但是我們不應忘記他們失準的批判同樣具有現實層面的基礎，在這裏我們完全可以認同那些基本的批判並作出如下的聲稱：



香港市民社會在過去30年中發展出的，允許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進行合流的主流意識形態在事實上反對了對於民主與自由的討論，而是一種單方面的，整體主義式的積極認同，他們將至高的（至少在當下的建制中）但又抽象的民族國家憲制的理念認同直接落實到現實的各個層面當中嘗試達成一種整體的統一，一種極權主義的根源。同時，當自由一詞被探討時，它非常俠義地指向了對於激進政治理念鼓動這一單一的事務，卻對於社會不同階層中所存在的具體的政治組織與行動空間不聞不問。這實際上是一種自毀式的行為。因為承認這一種廣義上的政治自由就代表了他們必須放棄僅僅宣稱那些政治理念的嘴皮子功夫而轉向真正的，充滿了曲折與自我批判反思的政治實踐，而這是絕大部分市民並不願意投身其中的一種事業。所以他們會擁護這樣一顆已然壞死的種子，因為這樣他們要做的便僅僅是埋怨而不需要真正開始耕種。而左翼要做的甚至不僅僅應該看到社會秩序銅牆鐵壁中間的空隙，更應該明確意識到這種自由歸根結底並不由政法建制直接作為一種實體而賦予，而是來自於一種必然的抉擇：換句話說我們是自由的並不是因為這個世界允諾了我們諸多仍然可以享受的自由（如婚姻，性愛，言論，交友，娛樂……），而是因為我們不得不做出被我們承認為自由意志的抉擇方能維繫我們自身的存在。由於我們還存在著並生存著，不管是心甘情願的還是被迫的，我們始終面對著自身的自由並仲介著自由，我們一方面承擔著它所帶來的沉重負擔，一方面又明白這是我們必然的抉擇而不再選擇抱怨，正因如此我們抱有的從來不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美好願景與幻想，而是一種接受現實之其所是的姿態。



由於我們不是由觀念的純潔性連結在一起的，因而我們並不會像一個孩童一樣因為得不到“想要”的玩具而撒潑耍賴。對於我們來說，那些在群體激進過程中我們曾經追求的事物，都通過我們自身的努力和掙紮變得得以實現，它們體現在我們對於失敗的自我反思與批判中，體現在我們會議的民主討論與決策的過程中，體現在我們執行過程的互相協作中，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我們是樂觀的。歸根結底，我們黨而不群。我們要有勇氣去拒斥一種民粹式的流行性，我們追求的不是成為意見領袖抑或是異見領袖，那種活動方式歸根結底不具有力量，我們堅持的應該是促進廣大勞動人民群衆之根本現實利益的團結一致。



# 食譜：《家常便飯》 · 二

---

## 棉籽

「你可能覺得，蝦子麵有邊個唔識煮呀？我本來都覺得呀，蝦仁炒蛋有邊個唔識煮呀？仆街！真係有人唔識炒……界呢一包蝦子麵界佢哋兩個煮呢，我諗呢佢哋會夠膽死原隻咁𢈚落微波爐度叮。」 (Eminleo, 2010)



# 蝦仁炒蛋

蝦仁炒蛋呢道菜，蝦仁新鮮彈牙，口感滑嫩，味道鮮美。雞蛋含有大量嘅優質蛋白質，價錢又唔貴。呢道菜嘅口感非常豐富，雞蛋嫩滑，蝦仁Q彈，蔥油胡椒粉惹味，食起身好有層次感。呢道菜做起嚟好簡單，又好快手，最啱屋企人一齊食。仲有邊個唔識煮？唔會真係有人唔煮……掛？

## 材料：

- 新鮮蝦 200克
- 雞蛋 3隻
- 葱蒜 適量
- 鹽 適量
- 料酒 適量
- 胡椒粉 適量
- 食用油 適量



## 步驟：

新鮮蝦剝殼去蝦線，洗乾淨之後放喺碗入面，加啲料酒、胡椒粉同鹽，撈勻，醃大概 10 分鐘左右。

將雞蛋打落碗度，加適量鹽，打散。蔥切成蔥花備用。

熱鑊落涼油（想香啲可以拍粒蒜子），放醃好嘅蝦仁，炒到金黃色，裝出鑊備用。

鑊中再倒少少油，倒雞蛋液，等蛋液稍微凝固，用鏟翻炒成細塊。

放炒好嘅蝦仁，繼續翻炒均勻。最後撒上蔥花，炒幾下就可以出鑊。

## 秘訣：

1. 掀蝦仁嘅時候，要留意佢嘅外觀。蝦仁應該完整，冇破損或者斷裂嘅地方。表面應該乾淨，冇黑斑或者變色。新鮮嘅蝦仁通常呈現出淡青色或者白色，而且色澤均勻。如果蝦仁顏色發黃或者發暗，可能唔夠新鮮。
2. 蝦仁醃製嘅時候，料酒可以去腥，胡椒粉可以增香。
3. 炒雞蛋嗰陣，油溫唔好太高，唔然雞蛋會炒老。蝦仁炒熟之後先盛出嚟，避免喺鑊入面太耐搞到口感變老。
4. 出鑊之前撒上蔥花，可以增加香味同埋靚啲。



# 蝦子麵

蝦子麵到底是怎樣煮的 面向一個正常人類嘅教程

材料：

- 蝦子麵 100 克
- 青菜 50 克
- 蝦仁 50 克
- 雞蛋 1 個
- 葱蒜 適量
- 鹽 適量
- 生抽 適量
- 食用油 適量



做法：

1. 將包蝦子麵原隻咁拆落微波爐度叮 (X)

好，認真：

1. 青菜洗淨切斷備用。

2. 鍋中加足量水燒開，放入蝦子麵，煮 3 - 5 分鐘，直至麵條熟透，撈出迅速過冷河，瀝乾水分。

3. 另起油鍋，倒入 10 毫升食用油，油熱後放入蒜子爆香，加入蝦仁，中火翻炒至蝦仁變色。

4. 倒入打散的雞蛋，用筷子快速攪拌，炒成蛋花。放入青菜，大火翻炒至斷生。

5. 加入瀝乾水的蝦子麵，放入 3 克鹽、10 毫升生抽，翻炒均勻。

6. 最後撒上 10 克蔥花，翻炒幾下即可出鍋。

秘訣：

1. 烹煮麵時水要多，保證麵條有足夠空間舒展，不易粘連。

2. 過冷河要迅速，能更好保持麵條口感爽滑。

3. 炒蝦仁時火候不宜過大，以免蝦仁口感變老。

4. 調味時可先少放鹽和生抽，嘗味後根據需要再添加。

5. 上一期我哋有教到過冷河嘅方法同埋作用。如果想蝦更加易熟同入味嘅話，亦都可以沿住佢嘅背脊切花。



# 常態實用化系統論（一）

## 愛與和平小天使

這是一本試圖運用控制論、系統論的某些概念來介紹科學方法論的書。

### --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

如果想要了解如何系統化的面對客觀世界，那麼這本書十分完善，但是顯然系統論作為「傳統三論」中控制論、信息論這兩者下顯得過於基礎，不像是可以直接出成果的東西，而是一種結合其他學科的一種基礎方法論。其中，突變理論及其他一些理論，據我所知，因為沒有“應用前景”而被冷落到邊角了，現有的結果是「變量太多，成功案例甚少」。

所以無論是對相關的介紹還是說明，筆者更傾向於「實用」的方向，而不是「解釋」的方向，整個過程會從發生學的角度出發，避免由於沒有權威背板導致的不可信。

筆者個人認為，獨處思考是一件有趣的事，我也盡量讓我的文字有趣一點，但終究會有大量難以理解的部分，這很多是因為本來也不會有人會嘗試去理解，所以我個人經常在思考上偷懶地跳躍，如果能說服讀者，想必是讀者自己的功勞。

總之，文字是筆者獨舞的時間。



系統是整體封閉的代名詞，對於任何現已存在的文字中「系統」都指代具體的已成立的規則所構成的整體，那麼系統分析，系統構建，也就不過是有限的排列組合中的特解，這顯然不是有生命力的說法，我們需要後撤一步，先回歸到一些哲學概念：系統論代表的世界到底是如何構建的？

在《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這本書中最後一章，提到「黑箱反饋理論」，「一開始，人們的主觀認識不一定符合客觀實際，甚至可能相差很遠。人們不斷地去實踐，不斷地把從理論得出的預期結果（B的輸出）跟人們實踐的結果（A的輸出）加以比較。如果理論結果和實踐結果有差距，那麼就需要我們修改自己的主觀認識，使理論結果和實踐結果之間的差距變小。這樣只要我們不斷實踐，不斷地比較，不斷地修改主觀認識，不斷地使理論結果和實踐結果之間的差距縮小，我們就能保證自己的主觀認識不斷地逼近客觀真理。」，這是具有局限性的，這個理論將人的主觀意識作為超出系統論本身可以解釋的範圍之內，同樣這也是一個社會控制論延伸出來的敏感話題，但是我們可以繞過這個敏感，因為我們可以再後撤：客體是如何來的？

當然不能將人的思考用「注意力機制」來判斷，因為我們連客體都沒有自然也沒有相關性或者是任何輸出，人在客體誕生之前是沒有輸出的，或者換言之下，在發生學順序上，客體在人之前。因此，我們可以先建立一個純粹的，由客體構成的系統論，然後再通過這個小的，造一個大的解釋人與客體的交互關係，這是由於客體在人的發生學順序之前，在整體符號系統中存在「前驅--後繼」關係，我們就可以在文字形式上實現這種「符號學歷史模擬遊戲」。

我們再回憶一下，我們是不是已經用過了客體構成的系統論？「前驅--後繼」關係顯然是其中一個，這是兩個客體的偏序關係，我們同樣可以把整個離散數學搬過來，但沒必要，因為離散數學同樣可以「用偏序關係全寫其他所有客體間關係」，我們只要保留其中最簡化的偏序關係就行了。



為什麼要最簡化，因為我的文字是有限的，讀者的閱讀是有限的，但是偏序關係是無窮，因為我們給任意兩個客體賦予「可以構造偏序關係」，再把不斷複製下去，我們可以假設自己是無窮無盡的，然後關係也就是無窮無盡的，因為是假設所以可以存在，但是我們自己不是假設所以我們自己不能是無窮無盡的時間。

那麼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我們」和「關係」，也就是我們和我們的抽象造物，是不是就存在隔閡了呢？並不是，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不斷複製」作為一個新的作為後繼的偏序關係誕生了，這個「不斷複製」變相地取消了「複製」這個行為，因為我們不能這麼做，所以我們用一個“記錄我們複製的行為並讓這個行為保持存在”的客體來替我們，這樣我們就可以達到我們需要的無窮無盡了。

顯然我們說到這裡，客體和關係這兩個詞語就要被我們拋棄了，因為我們有了更重要的「基礎」，即「保持存在」和「替出來的」。只要存在與我的文字，那麼即為

「保持存在」，那麼我們之前提到的所有概念，都是被我們的「保持存在」「替出來的」「臨時存在於想象中的」，我們到此，就可以問出一個問題，而且是可以被實在解決的，簡單的，最終極的問題：什麼是最前驅的「保持存在」，什麼是最後繼的「替出來的」？

人類對於這個答案有了無數追求，我給出系統論在客體領域適用，再延伸出來的答案：由於不輸出的系統是無效系統，因此反饋就可以指代系統本身，系統中不輸出的在符號學不顯現，那麼我們就可以排除包括一切我們可以把握到的事物，只剩下我們這個「瞬間」的發生，也就是「即時的神經系統所產生的反饋」，簡稱「神經反饋」作為一切發生的起點，在發生學上，早於包括倫理、道德等等一切無論是人還是客觀世界或者什麼。



這是真的嗎？假設這個問題有解，那麼這應該是唯一解，時間的追溯只能追溯到當下的瞬間，當下的瞬間產生一切，這在符號學上是合理的，這抹掉了歷史嗎？並不是，歷史成為了「在當下以別的事物的發生作為時間的發生學順序」，時間在這個意義上不是最前驅的，而是排除了「這個時間」的發生之前才有的。

所以，我們得到了答案，神經系統就是作為「最整體的整體」而存在的，這也是一個毫不留情的說法，但是倫理和道德可以在這之後發生，這我們可以之後說。在神經系統中，與客體構成的系統一樣，「保持存在」和「替出來的」對應「神經元占用」和「神經元解除占用」，那麼哪個對哪個呢？我們知道生物是進化來的，神經元是進化時間較短中大量增多的，那麼顯然神經元常態是占用的耗能比不占用的多，在進化是趨於劣勢，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神經元的模型，作為我們扔在一旁的「客體」一樣的地位：神經元常態是不興奮的，只有外界刺激，就會興奮產生反饋，外界刺激停止就停止反饋。這有什麼用嗎？顯然這只是一個低級神經中樞就有的功能，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聰明的人，而不是一個脊椎動物。

不，就算你把「關係」也加上，高級神經元反饋，好了這也就是一個高級機器，還只是一個「有限的人」，人的可能性是無窮的到底怎麼體現？答案是，人具有將反饋存儲的功能，存儲的反饋作為高級神經元存在，改變人的行為。可悲的決定論，不是嗎？

那麼回到我們的終極問題，最後繼是什麼？顯然，「一切反饋的終止」，人的死亡的想象，對極樂的想象，愛欲的構成都離不開終止，這有點搞笑了，變成一種不倫不類的宿命論了。



那麼再往前一點點，我們就可以得到那一句經典的名言：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從事藝術之類的工作，也就是理想社會的人，是嗎？顯然不是，藝術怎麼可能不反映現實，我們這裡可以直接得出藝術就是現實反饋的後繼，通過這種後繼臆想出痛苦再取消臆想，同時臆想現實痛苦可以取消。

這種話有點像純粹的垃圾話，不過我們可以據此提出我們的下一個想法：苦樂為什麼不能簡化？

那麼人是什麼？我們雖然說了人作為一個整體的一點，那麼你在這個整體中到底是怎麼存在的？

答案是，所有人都不知道人是什麼。有點胡扯的意味。

不是這樣的，我們要先知道，對於絕大多數物質，是對人沒有任何特殊記憶的必要的，大部分人常態處於放鬆，這時候人的大腦和一些低級中樞差不多，就是做固定的事，只不過大腦會不斷修正控制過程的偏差以更好地達到目的，這是前面提到的「黑箱反饋理論」，但是對於人不一樣，我們從出生便面對饑餓的威脅，這時候的放聲啼哭就是我們無力獨自面對世界的體現，但是我們又迅速地停止了啼哭，因為叼著奶嘴不能哭。當然不是這樣，是因為我們知道奶嘴可以為我們帶來溫飽，這是對於任何完全獨立的生物不可能做的的事，即在自己沒有任何察覺，沒有任何經驗的情況下，就能吃飽。直到長大到一定地步，新生兒才能意識到那些面孔和自己一樣，而不是那些面孔就是肚子飽。

可以簡化，苦樂這一對概念我們可以人為地構造偏序關係，然後用偏序關係和其中一個概念就能表示整體，比如苦和不苦，那為什麼不是樂和不樂呢？上文我們已經得到神經元的結構了，那麼我們也可以得出苦就是神經元被占用，得不到解除占用，樂就是解除占用了，那麼在發生學上，占用的耗能更多對應符號學上的顯現也是合理的。在以上這些簡單的「硬性規定」之後，我們才能有討論人在「瞬間」做出決策的基本，也就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系統，否則我們連討論的順序都沒有，更別提完全解決了。



即使兒童遇見真正沒有利於他關係的人，這種對人的想象都沒有停止，從肚子飽，到特定的人會給予好處，到服從與收獲，兒童都沒有任何改變，本質上都是反饋他人的表現。直到這個兒童嘗試控制他人的表現，開始思考：為什麼他要怎麼做？

相信我，絕大多數人不會問這個問題，或者說只會反問這個問題，他們會說：誰誰誰這麼做是因為某條規則。同樣他們也會因為別人不服從某條規則氣急敗壞，或者是因為別人服從某條規則氣急敗壞因為他們服從「不服從某條規則」。人的行為在被這個兒童觀察的瞬間客體化了，變成了一種影響對這個人整體判斷的一個起點，被觀測的起點。這樣的兒童始終沒有「人」的概念，因此不可能超出服從於他們的規則，或者說，有的人就是這樣的。

那麼直到他問出這個問題，說明「人」對他造成足夠的影響力，這樣這個兒童就被抬到鬥技場上，成為了博奕的一環。此時，這個兒童才有預測他人行為的能力，有觀測自我的能力，有說服他人的能力，這些都是在「人」的重大影響之下被訓練出來的。

這些能力是必要的嗎？顯然不是，因為大多數人沒有也不在意，人與人的相處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們可以在意，因為這是一個抓手，可以反向推導一個人的經歷。諜報學的用處不大，測量量和計算量都太多，但是在社會信用上卻是有一些可能性的。



這就不得不提老生常談的話題，我們怎麼確保一個人是可信的？相處的時間夠長，或者之類的其他，這是相當模糊的說法，具體說就是「黑箱反饋理論」，是這樣的嗎？還不夠，人作為人的最基本是怎麼產生的？從「神經反饋」中。注意你可能理解是「別人的神經反饋」，但不是，他人的反饋你不能監測，即使能也有時差且不完全。在符號學上，他人是作為你的「神經反饋」後繼出現的，實際上就是你的神經反饋的覆制，也就是說你把你的神經系統投射到他人身上，想象出的他人就是你自己的另一個體現。那麼你對自己信任，對他人就信任，當然這裏的信任是指確保會做某些行為。而對自己的信任，就是神經反饋的集合。同樣的對於抽象的「規則」，也可以這麼簡化，同樣是神經反饋的集合，這樣我們把他人和規則也納入神經反饋的範疇里面去了，作為一種被記憶的特殊反饋處理。



所以，實際上我們可以把人用神經反饋簡化，將客體也用反饋簡化，這樣就將人和客體同質化。如果我們要對這個系統進行監測，只要觀測其中的反饋就可以了。這樣我們可以實現一些社會學功能，比如說通過信道數判斷影響力，通過超信道的預想系統來判斷被影響程度，比如說引入一種文化或類似的文化改善關係，或者是檢查生理動態，等等之類的各種。

然而這種工作最困難的地方還在於改變反饋，絕大多數系統就像代碼一樣能跑就行，至於耗時耗空間耗電那不是程序員考慮的問題，系統也不是系統中的人考慮的事情，如果工作的收獲只不過是做了兩倍的工然後多了一個改善計劃，這個過程是充滿風險而且令人沮喪的。不過對於高壓環境來說，能有出路總比困斃強，不是嗎。

人與符號系統共生，也許到時間各種東西都會長出來，被舍棄掉的部分也會成為無心插柳。

在高壓狀態下，人的思考會超出自身可以解釋的範圍，多因素的條件不是作為人的線性偏序輸出的口舌可以展現的，更不是同樣作為人會有耐心聽和自己無關的苦難所能容忍的，我們時刻都可以說有個「計劃」，但實際上沒人願意聽，因為願意聽的也知道那不過是消遣罷了，而消遣正是願意的浪費。

我們確實活在大量的浪費裡面，我們為了大量遠遠超越現實的東西，或是因為現實的人的影響，或是因為自己的癮癥導致，追求著我們也不知道的如何，這種浪費從生子養老的氏族文化開始，生產力不斷過剩來維持整個符號系統，或者是這就是我們的必然之路。



# 中介 MEDIATION

## NO.2

### 九月 2024

排版設計

棉籽

美術

CLAIRE

棉籽



「同前輩一樣，我們也被賦予了一點微弱的救世主的力量。」  
應相互扶持絕不放棄鬥爭與力爭上游的志氣，自視甚高者若環顧周遭所謂的艱苦愚鈍，怎能不捶胸頓足咒罵自己的無能與虛偽。  
在此處，便讓精神曲折地，掙扎地栖息在現實的鬥爭當中。